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7年9月11日至29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的 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人权理事会转交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加扎伊利按照人权理事会第27/21号决议和30/2号决议编写的报告。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列出了他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主要活动。然后，他在对受害者可用的各种机制进行审查、评估和评价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提供补救和补偿的问题。最后，他就采取措施加强或创造补救方法提出了建议。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4
三. 特别报告员先前建议的后续行动.....	4
四. 域外管辖与国际制裁.....	5
A. 国际法中的域外制裁.....	5
B. 与制裁有关的国家域外义务.....	9
五. 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设立专门赔偿委员会的备选办法.....	11
六. 结论和建议.....	12
附件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expert working group convened in Geneva on 3 June 2017	14
Appendices	
I. Elements on the 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likely to have a human rights impact.....	16
II. Elements for a draft General Assembly declaration on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nd the rule of law.....	18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一. 导言

1. 本报告由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加扎伊利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7/21 号、第 30/2 号及第 34/13 号决议提交。
2. 大会在第 70/151 号决议中和人权理事会在第 30/2 号决议中，要求特别报告员在向两个机构提交的下一次报告中，重点阐述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阐述补救和补偿问题，以推动问责和赔偿。
3. 根据这些要求，特别报告员在向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提交的报告(A/71/287)中，集中阐述了向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提供补救和补偿问题。该报告审视了一般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关于对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所造成的侵犯人权加以补救的概念。本报告是与特别报告员早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A/HRC/33/48)并行编写的，目的是对两个报告一并解读。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初步评论和评价了受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影响的国家和个人实际或可能利用的、能够寻求补救和补偿的各种机制。
4. 特别报告员在向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提交的报告(见 A/70/345, 第 56(a)段)中，建议设立一个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登记册，由秘书长进行保管和更新。这个登记册可能会在人权方面发挥作用。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上一次报告和向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提交的报告(A/71/287)中，他呼吁这两个机构通过发表一个宣言以庄严的方式重申，在人权遭受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不利影响的一切情况下，受害者享有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包括适当和有效的经济赔偿。
5. 大会在第 71/193 号决议中表示，感兴趣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报告所载建议，要求他在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提供关于人权理事会讨论他的建议的更多资料。
6. 人权理事会在第 34/13 号决议中要求特别报告员继续特别注意并查明可以立即解决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受害者人权的不利影响问题的办法，并在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的下一次报告中，重点阐述促进问责和对受害者补偿所需要的资源和补偿。
7. 因此，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重点阐述了查明的可以确保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和补偿可能建立的机制。报告首先概述了他所提出的设立一个联合国登记册登记可能对人权产生影响的单方面制裁的建议的目前状况，以及通过一项关于发表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与法治宣言的建议的目前状况。然后，他根据他在上次报告(见 A/HRC/33/48, 第 48 至 50 和第 74 段)中阐述的调查结果，详细阐述了为向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提供补救而可能设立的赔偿委员会可能具有的特征。他还谈到了域外制裁做法产生的某些有关问题，以及国家承担的人权义务的域外特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将向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提交关于同一专题的报告，对本报告予以补充。
8. 特别报告员欢迎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任何其他有关各方在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人权的不良影响提供补救和补偿问题上提出任何评论、资料及建议。

二.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9. 在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特别报告员发表了 7 份新闻稿，其中 3 份是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发表的。

10. 2016 年 4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第十八届会议，在会上与专家就行使和实现发展权进行了互动对话。

11. 10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独立常设人权委员会于阿布扎比举行的国际发展权研讨会上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谈到了在《发展权利宣言》三十周年之际的感想，并阐述了利用发展权促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12. 10 月 16 日，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了报告(A/71/287)。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国际法中对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所造成的侵犯人权予以补救的概念方面。

13. 特别报告员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对俄罗斯联邦进行了正式国家访问(见 A/HRC/36/44/Add.1)。他感谢俄罗斯联邦主管部门配合他执行任务。访问结束时，特别报告员发表了一份新闻稿，表示了他的初步意见和建议。他指出，制裁可能导致欧盟和俄罗斯联邦遭受总额达 1,55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没有明显的益处。他指出，对个人实行的定向制裁缺乏任何形式的正当程序，违反法治。

14. 特别报告员 2017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对欧洲联盟各机构进行了正式访问(见 A/HRC/36/44/Add.2)。他感谢欧盟有关方面配合他执行任务。访问结束时，特别报告员发表了新闻稿，表示了他的初步意见和建议。

三. 特别报告员先前建议的后续行动

15. 特别报告员自被任命以来，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了年度报告，其中载有与他的任务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16.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先前的所有建议，特别是关于在联合国一级设立一个综合中央登记册的建议，汇编实施的所有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清单。该登记册应根据安理会目前适用的制裁标准进行登记，并予以公布。应要求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目标国或实施国/起源国或国家集团主动通知安理会它们主动实施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及这些措施的演变情况。可以参照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模式建立这种机制，常规武器登记册包括关于国际武器转让的数据及会员国提供的关于军事财产、国产采购情况及相关政策的资料。

17. 特别报告员已经适当地注意到人权理事会在第 34/13 号决议中表示的关注。人权理事会强调必须审查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及各国的经济、和平、安全及社会结构的广泛影响，以及需要对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监测，并促进问责。在同一决议中，人权理事会承认，在确保对任何国家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从而导致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体问责上，拥有关于这种不良影响的所有定量和定性记录是重要的。特别报告员认为，为了确保拥有这种记录，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登记册。必须向登记册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且必须使它有效地运作，以准确地评估单方面制裁的不利影响，从而确保实行问责和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正如特别报告员已经指出的(见 A/71/287, 第 39 段)，采取措施确保所实施制裁制度的透明度，是为单方面强制

性措施对人权造成的不良后果实现获得补救权的一个先决条件。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一些与会者对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建立中央登记册的建议表示支持，他对此表示欢迎。¹

18. 特别报告员还再次呼吁人权理事会和大会在一项宣言中重申，在人权遭受单方面措施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所有情况下，受害者享有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包括适当和有效的经济赔偿。虽然这种权利在理论和原则上已被承认是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迄今为止尚未以具体方式予以承认或确认，而且在实践中经常被忽视或搁置。国际上已经确认和广泛承认武装冲突受害者享有获得补救的权利及其实现条件，² 而与武装冲突受害者不同，单方面制裁受害者仍然往往处于在法律上无人过问状态。

19. 特别报告员继续就他提出的关于宣言草案和单方面制裁登记册的建议进行工作，于 2017 年 6 月 3 日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专家工作组会议，审查、评论及完善这两项建议，并将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这两个建议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本报告的附件载有此次会议的成果文件。

四. 域外管辖与国际制裁

20. 与国际制裁有关的域外管辖问题引出了两个单独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根据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制裁的域外延伸是否是可接受的(或合法的)；在实施制裁和制裁造成的影响上，国家(或国际组织)是否应该根据人权文书承担域外义务。

A. 国际法中的域外制裁

1. 一般国际法

21. 二十多年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常常对外国人和机构适用该国的国内制裁法。³ 例如，它对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境外进行了不符合美国制裁制度的金融交易实施制裁，并试图监管外汇交易。⁴ 据最近的报告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正在引进具有相同特性的新立法，尽管形式较为有限。⁵ 据了解，相

¹ 例如，见巴基斯坦常驻代表 Tehmina Janjua 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发表的评论(2016 年 9 月 13 日)。

² 例如，见《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

³ M. Rathbone, P. Jeydel 及 A. Lentz, “制裁，到处制裁：通过复杂的跨国制裁法建造一条路径”，《乔治敦国际法杂志》，第 44 期(2012-13 年)，第 1055-1126 页。

⁴ 例如，见 M Cosnard, “《赫尔姆斯-伯顿法》与达马托-肯尼迪禁止在一些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法国国际法年刊》，第 42 期(1996 年)，第 33-61 页。

⁵ 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财政部及国际贸易部，“关于英国未来采取和实施制裁法律框架的公众咨询”，2017 年 4 月向议会提交，第 16 页。根据该文件，诸如在海外进行英镑交易而在英国国内结算、英国母公司的当地子公司采取的行动(取决于管理结构)、在海外发生的行为但受英国国内指挥、在英国市场上买卖但在海外持有或使用的金融产品或保险等事件可能造成“与英国有关”(使政府能够实施制裁)。

比之下，欧盟一般不采取任何具有域外管辖性质的限制性措施。⁶ 欧洲联盟 1996 年通过的欧洲联盟法律文书目前仍然有效，该文书的目的是反击美国声称的制裁制度的域外效力，欧盟认为那是非法的。该文书的条款规定：“第三国制定了某些法律、法规及其他立法文书，声称监管(欧盟)成员国管辖之下的自然人和法人的活动；……这种法律、法规及其他立法文书的域外适用违反国际法”。⁷

22. 普遍认为，域外制裁无视国际法规定的、普遍接受的国家管辖权法则。⁸ 国家管辖权概念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个人制订、适用及执行行为守则的法权限制。它主要涉及每个国家规范行为或事件后果的权利程度。⁹ 换句话说，司法管辖权涉及国家根据国际法调控或以其他方式调控人民、财产和境况所受影响的权利，体现国家主权、国家平等及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¹⁰

23. 与管辖权有关的国际法一般是基于立法管辖权(即制订法律的能力)与执行管辖权(即确保执行法律的能力)之间的区别。立法管辖权必须基于某些确认的标准，以避免国家之间的主权冲突。关于这些标准的通常阐述如下：

- 属地管辖权原则。根据该原则，一个国家可以颁布关于规范自己领土上的人民和财产的法律。
- 国籍管辖权原则。根据该原则，国家可以规范在世界各地的本国国民的行为。
- 实效论。根据该理论，一国可以规范在其领土内有直接的、可预知的、实质性影响的行为，即使产生影响的行为是在国外实施的。这个原则可以被看作是属地管辖权原则的延伸。
- 被动属人管辖权原则。根据该原则，一国在对其本国公民安康有直接影响的行为上拥有管辖权。
- 保护管辖权原则。根据该原则，国家可以规范可能损害本国最重要利益的外国人的行为；然而，虽然在国际法中已经建立了这一概念，但它涵盖的范围和行为仍不明确。
- 普遍管辖权原则。根据该原则，所有国家可以对某些犯罪活动、特别是海盗行为和类似奴隶制的习俗行使管辖权，无论犯罪地点和受害者或罪犯的国籍。

⁶ 例如，见 J. Scott, “欧盟法律中的治外法权与领土延伸”，《美国比较法杂志》，第 62 期(2014 年)，第 87-126 页；J. Scott, “新的欧盟‘治外法权’”，《共同市场法评论》，第 51 期(2014)，第 1343-1380 页。

⁷ 欧盟理事会，关于保护免受第三国实施的法律的域外适用及由此产生的行动或导致的结果造成的影响的《欧盟理事会 1996 年 11 月 22 日第 2271/96 号条例》，《欧洲联盟公报》，第 309 期(1996 年 11 月 29 日)，序言部分。

⁸ 见 M. Cosnard, “Les lois Helms-Burton et d’Amato-Kennedy”, pp. 36-50。

⁹ R. Jennings and A.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1992), p. 456.

¹⁰ M.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69.

24. 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认为域外制裁是非法的，¹¹ 理由是大多数域外制裁基本上不能援引任何上述标准。¹² 特别是，美国有时为证明实施域外措施有理而援引的实效论，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在法律上可能是适当的，因为(引发制裁决定的情况)在制裁目标国领土上产生的上述实效，须合乎直接的、可预见的及实质性的等多重要求。似乎也可看出，根据关于国家责任的法律，通常不能证明域外制裁是合法的反措施。

25. 联合国机构、其他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过去都对域外制裁做法做出了一些负面反应，学术文献对此也有反映。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域外制裁是非法的。¹³ 自 1992 年以来，大会每年都对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的域外管辖做法表示谴责。¹⁴ 1996 年，欧洲联盟通过了一项所谓的《阻挡法规》，禁止欧盟公司遵守美国实施的域外制裁。¹⁵ 欧盟在自己的“限制性措施”准则中，也表明了反对域外制裁的如下立场：

“欧盟将不制订违反国际法的包含域外适用的立法文书。欧盟谴责第三国法律的域外适用，这种适用强制实施旨在规范欧盟成员国管辖之下的自然人和法人活动的限制性措施，这是违反国际法的”。¹⁶

26. 旨在根据国际法对单方面域外制裁做法进行评估的综合研究，远远超出本报告的范围。综合研究是今后需要完成的任务，最好由国际法委员会承担。这种研究需要对现行国际法中关于禁止诉诸域外制裁的任何法规的存在、内容及确切法律地位进行全面调查。这项研究还必须概括所有已知的联合国对域外制裁的批评反应，也包括区域组织或各国的批评反应，以及以抗议活动、各国国内制订的拦阻法律及国内法院关于不承认的判决等形式表示的批评反应。这项研究还必须根据国际责任法评估使用域外制裁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2006 年，国际法委员会审查了秘书处的一份关于域外管辖的初步报告，可以将这个报告作为编纂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法的长期工作的基础。¹⁷ 可以(或应该)以某种形式恢复这一建议。

2. 国际人权法

27. 总的来说，已经广泛记录了国际强制性措施对被制裁的人口享有人权的不利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域外制裁是否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制裁的特别特征(即，

¹¹ 见 C. Beaucillon, “行动促使完美，最终？国家单方面制裁与国家法律的治外效力”，N.Ronzitti 编写的《强制性外交，制裁与国际法》(Leiden/Boston, Brill/Nijhoff, 2016 年)，第 103-126 页；以及 S. Emmenegger, “域外经济制裁及其在国际法中的基础”，《亚利桑那州国际与比较法杂志》，第 33 期(2016 年)，第 633-660 页。

¹² 见 M. Cosnard, “Les lois Helms-Burton et d’Amato-Kennedy”, pp. 36-50。

¹³ 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谴责治外制裁外，不结盟运动国家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例如，见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 RES/51/S6 号决议)。另见欧盟理事会，《欧盟理事会第 2271/96 号条例》，提及上述立场。加拿大、日本及其他国家似乎也有同样看法。

¹⁴ 见大会第 47/19 号决议及之后的各项决议。

¹⁵ 欧盟理事会，《欧盟理事会第 2271/96 号条例》。

¹⁶ 欧盟理事会，《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下限制性措施(制裁)的执行和评估指导方针》(2012 年 6 月 15 日)，第 52 段。

¹⁷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第 10 号补编(A/61/10)。

它们是否可能对人权产生造成特别的不利后果)。有人指出,这种特别影响源自域外制裁,影响被制裁国(及其人口)及未卷入制裁国与被制裁国之间争端的第三国与全球商业和金融界互动的能力。它们本身很可能对包括发展权在内的人权造成特别的额外的不利影响。大多数国际企业在法律上不受制裁国管辖,然而实际上不愿意与被制裁国的企业发生任何经济关系,因为这可能导致它们“违反”域外制裁制度的规定,进而可能危及它们在制裁国中进行商业活动的的能力。这导致被制裁国贸易伙伴的过度遵守,具有破坏性。在法律上不受制裁国管辖的经济行为者甚至自愿遵守制裁制度,导致对被制裁国实际封锁的结果。域外制裁的明显额外影响,也可能表现在对被制裁国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联系、进入外国金融市场及获得国际援助的能力的影响。

28. 仅举一例,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域外制裁(在2016年在法律上而不是实际上解除制裁之前)对该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商务往来和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造成的影响,被描绘为实际上的全球禁运。《赫尔姆斯—伯顿法》产生的影响包括阻止古巴进入全球金融机构,以及阻止古巴进入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这在古巴经济危机背景下造成了严重影响。¹⁸

29. 单方面实施域外制裁也可能对第三国人民享有人权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国家不是被直接制裁的国家,但是(具有域外管辖性质的)外国法律的实施,阻止它们与被制裁国保持经济关系。长期以来有人一直认为,安全理事会对一些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对诸如贸易伙伴等第三方造成意外的不利影响。《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在对任何国家采取防止或强制执行措施时,任何其他国家遇有因此项措施之执行而引起之特殊经济问题,应有权与安全理事会磋商解决此问题。

30. 可以公正地认为,实施单方面(域外)制裁可能造成同样的不利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与《宪章》第五十条相似的法规可以引用。

31. 欧盟理事会第2271/96号条例(《阻挡法规》)旨在对外国实施的域外制裁对欧盟经济企业开展(当时的)欧洲共同体与(被制裁的)第三国的国际贸易和/或资本流动及相关的商业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行处理和补救。¹⁹ 针对实施域外制裁采取的保护,特别包括欧盟法定不承认域外制裁的法律效力。²⁰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通常禁止欧盟经济运营商以任何方式遵守域外制裁,²¹ 但它们仍可能寻求允许完全或部分遵守,以便不至于因为不遵守而使它们的利益或共同体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²²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书还详细规定了向受影响的人提供补救。与被制裁国有贸易或经济关系的欧盟企业有权因域外管辖法律的实施对他们造成的损害而获得赔偿,包括法律费用。可以从造成损害的自然人或法人或任何其他实体或代表他们行事的任何人或中介获得赔偿。赔偿形式可包括扣押和出售

¹⁸ C.J. Gordon, “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与对域外管辖的外交挑战”, 《弗莱彻世界事务论坛》, 第36期(2012年), 第69-70页。

¹⁹ 《欧盟理事会第2271/96号条例》, 第1条。

²⁰ 同上, 第4条。

²¹ 同上, 第5条。

²² 同上, 第5条。

这些人、实体、代表他们行事的人或欧盟内的中介拥有的资产，包括在欧盟注册的法人持有的股份。²³

32. 可以公正地指出，尽管《阻挡法规》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能使欧盟保护自己免受域外制裁的影响。但不幸的是，该法规过去未能保护一些欧盟公司(包括银行)，原因是美国财政部以未遵守美国的制裁为由对这些公司处以巨额罚款。令人不安的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一般不执行《阻挡法规》的规定，也不为受到外国制裁的域外影响的国民提供任何形式的外交保护。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没有将这一文书的适用扩大到涵盖美国最近的具有域外管辖性质的制裁措施。

B. 与制裁有关的国家域外义务

33. 仍然在辩论的问题是，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担的义务是否扩大包括域外义务，“扩大到实施制裁的国家即使对有关国家的人口不进行正式管辖或控制，也可能因为实施制裁所造成的任何相应的剥夺(例如剥夺获得食物或医疗服务的权利)，而被追究责任。”²⁴ 不过，特别报告员谨强调指出，强有力的趋同的法律观点认为，根据《公约》，确实存在着可能涵盖实施国际制裁造成的状况的域外国家义务。有人指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权条约原则上不仅规定了国家在本国领土上实施措施时承担的义务，而且也规定了域外义务，其中可能包括积极性义务，达到国家甚至可以影响国外的状况的程度”。²⁵ 似乎很难否认属于国家可以影响国外状况种类的制裁。²⁶

34. 首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适用范围上没有领土或管辖限制。²⁷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1)款规定了缔约国承担尊重和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的义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1)款有相似的规定，未提任何“管辖”或“领土”。此外，后者使用与前者不同的语言：每个缔约国家承担义务，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以便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²⁸ 这显然意味着缔约国承担某些具有域外或国际性质的义务。²⁹

²³ 同上，第 6 条。

²⁴ M. Craven, “剥夺的暴力：域外管辖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行动》，由 M. Baderin 和 R. McCorquodale 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1 页。

²⁵ O. De Schutter, “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基于人权的方针”，2008 年 11 月，第 3.2 段。可查阅：www.iatp.org/sites/default/files/451_2_104504.pdf。

²⁶ 同上。

²⁷ M. Sepulveda 和 C. Courtis,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域外义务是否可审查？”，《北欧人权杂志》，第 27 期(2009)，第 55 页；另见 M. Milanovic, “人权条约的域外适用”(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7 页。

²⁸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1(2)和 15(4)条进一步重申了国际合作。第 23 条指出，为实现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采取的国际行动应包括签订公约、提出建议、进行技术援助、以及为磋商和研究的目的同有关政府共同召开区域会议和技术会议等方法。

²⁹ M. Craven, “剥夺的暴力”，第 71 页。

因此，似乎可以认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国家对第三国个人的某些域外义务。³⁰

35. 第二，“管辖”概念是国家履行法定人权义务的标准(一个“领土”的替代标准)，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扩展，扩展至通过限制性地适用领土或管辖要求，令人满意地处理状况，而在相关条约中，不允许这种适用。因此，建立了与“被占领”领土有关的管辖³¹，与国家实行了某种形式的“有效控制”的领土有关的管辖。³²以这些调查结果作为起点，将这些结果应用于某些措施被指控因其本身性质而具有域外管辖效力(即制裁)，可以合理地认为，实施制裁的国家应对侵犯人权负责，即使它不对被制裁的人口或领土实行正式“管辖”或“控制”。如前所述，鉴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不包含领土或管辖限制，实施制裁的国家更应对侵犯人权负责。

36. 此外，可以提出认为，这样的立场符合习惯国际法的规则，习惯国际法禁止一国允许使用其领土在另一国领土上制造损害。在国际环境法中，这项要求更具相关性，³³可以认为它与人权保护领域是相关的。³⁴

37. 此外，这种观点赞成根据人权条约承担域外义务，承担域外义务完全符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实际做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经济制裁与尊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关系的第8号一般性意见(1997年)中规定了对实施、维持或执行制裁措施的责任方的义务，不论是国际社会、一个国际或区域组织、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承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产生的这些义务中，委员会确定了对受制裁国内的脆弱群体遭受的不适当的痛苦作出反应的义务。

38. 在同一一般性意见中，委员会阐述了下述意见：当外部的一方对一国内的形势担负起责任，哪怕是部分的责任，那么该方无疑有责任尽其一切可能保护受影响的人口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特别报告员认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尽管被制裁国家有责任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人民，但一个实施制裁的国家只要实际上

³⁰ 例如，见 F.Coomans，“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工作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域外范围”，《人权法评论》，第11期，(2011年)，第1-35页。

³¹ 见 Gondek，“全球化世界中的人权延展：人权条约的域外适用”(Antwerp, Intersentia, 2009年)；F. Coomans，“《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域外范围”，第6页。

³² 例如，见国际法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I.C.J. 2004年报告》，第136页，第112段，提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以色列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适用于在它有效控制之下的所有领土和人口(见E/C.12/1/Add.90，第15和31段)。另见欧洲人权法院，Loizidou诉土耳其(第15318/89号申诉)，1995年3月23日关于初步反对意见的裁决，第62段：“由于军事行动(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产生的后果，一个缔约方对本国领土以外的地区行使有效的控制，就引起它的责任。”

³³ 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商业活动范围内的义务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所指出的。

³⁴ 见 N. Vennemann，“国际人权公约在跨界国家行为上的适用”，载于 R. M. Bratspies 和 R.A. Miller 编写的《国际法中的跨界损害，关于特雷尔冶炼厂仲裁的教训》(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第295-307页；De Schutter 及其他人，“对《关于国家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领域的域外义务的马斯特里赫特原则》的评论”，《人权季刊》，第34期(2012年)，第1084页；L. Bartels，“欧盟与有治外效应的政策有关的人权义务”，《欧洲国际法学报》，第25期(2014年)，第1081-1083页。

对被制裁国国内形势承担部分责任，事实上也有义务保护受影响人口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39. 委员会的其他调查结果指向同一方向。委员会在关于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的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中强调，缔约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实施禁运或采取类似措施，限制向另一个国家提供充足的药品和医疗设备。有人指出，委员会的这一明确立场，可以被解释为是对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领域的域外人权义务的含蓄承认。³⁵

40. 应该补充的是，作为一项原则，在实施制裁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实施的制裁对第三国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排除关于国家责任(和/或国际组织责任，视情况而定)的一般原则的适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包括国际法委员会 2001 年通过的构成案文)第 1 条阐明了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一国的每一不法国际行为都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这应被视为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个人或人口的人权造成侵害的不法行为。甚至有人认为，关于一国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一个国家有责任控制私人在其国家领土内的活动，如果在另一国境内对个人或其他合法利益造成损害，该责任同样适用。³⁶可以说，同样的义务更适用于国家直接实施的单方面制裁。如果通过国内(制裁)措施的域外实施非法行使管辖权，导致对第三国造成不利影响(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影响)，实施制裁的国家也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五. 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设立专门赔偿委员会的备选办法

41. 特别报告员以前曾提到，为向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赔偿设立赔偿委员会的可能性(见 A/HRC/33/48, 第 48 至 50 和第 74 段)。有人提出，鉴于迄今为止在实际上和法律上，受害者，无论国家、个人或实体，几乎没有国际法庭可用，而且在联合国人权机构基于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影响处理索赔的权力上仍然存在争议，这种选择将是确保向受害者普遍提供补救的最明确的方法。

42. 有人指出，这样的赔偿委员会可以借鉴的模式是，以往最常用来满足为武装冲突受难者提供补救的需求的类似机制。尤其应考虑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先例。该委员会是根据第 687 号决议(1991 年)设立的，是安全理事会的附属机构，其任务是审查、决定和支付伊拉克因非法入侵科威特而应负责的索赔。³⁷尽管对委员会有批评，主要涉及建立过程的政治化，对索赔进行判决时缺少法治以及向受害者发放资金的来源(从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中转交)，但可以从委员会的运作中吸取教训。委员会的一些特征与受害者为人权遭受侵害而寻求赔偿的权利直接相关。

³⁵ F. Coomans,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域外范围”，第 12 页。

³⁶ I. Brownlie, 《国家法律制度，国家责任》(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3 年)，第 165 页。

³⁷ 见 M. Frigessi di Rattalma 和 T. Treves 编写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手册”(海牙，国际法学家协会，1999 年)；H.M. Holtzmann 和 E.Kristjánsdóttir, “国际大众索赔程序：《法律和实践视角》(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2007 年)。

43. 可能还需要对其他赔偿委员会的相关性进行调查，无论它们是什么名称。过去建立了若干机制，是通过有关国家之间达成协议或安理会通过决定来设立的。

44. 可以在安理会之下设立这样的赔偿委员会，或者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谈判达成多边公约设立赔偿委员会。

45.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赔偿委员会的资源和资金。可以要求对其他国家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国家出资。还有人提出，为赔偿委员会提供资金的一个务实的可能性是，规定将被制裁国的全部或部分资金摊款转拨给多边金融机构，然后由多边金融机构划拨给赔偿委员会，这不会对被制裁国造成任何负面后果。因此，后者将在有关多边金融机构中保留其正式成员权利，包括投票权，与摊款没有被转移一样。

46. 需要特别注意赔偿委员会的机构特征和运行模式。需要解决的一个初步问题是，是否最好为现有的一切制裁措施建立一个单一共用的赔偿委员会；还是作为一种选择，建立几个赔偿委员会，每个赔偿委员会为一个单一制裁措施受害者遭受的损害提供赔偿。

47. 赔偿委员会需要按照严格的议事规则运作，并应设计为能够对诉讼进行迅速、公正、有效的评估和裁决。特别是必须商定下列要点：

(a) 赔偿委员会裁判机构的组成；设立一个单一小组或几个小组，以及委员会(或小组)成员的指定和更换方式；

(b) 确定赔偿金额的方法及向受害者提供的方法；

(c) 设立秘书处和监督机构；

(d) 要求索赔人必备的条件和索赔的可受理条件(资格标准)；联合国赔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综合索赔制度，根据该制度，只有国家有权代表其国民和公司提出索赔，但可用受害者有权直接采取行动作为一种替代；

(e) 关于程序、证明及证据的适用规则；

(f) 提出索赔的期限；

(g) 关于对委员会决定提出上诉或复议的机制的规定。³⁸

六. 结论和建议

48. 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再次确认关于人权受到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不利影响的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有效补救、包括适当和有效的经济赔偿的原则。这种确认自然源自《世界人权宣言》和一些其他人权文书所规定的一般原则，即，人人有权因自己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而获得有效补救。没有理由可以让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免于遵守这项一般原则，这一原则旨在使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受害者受益，不论这种侵犯行为的具体事实或情况如何。值得回顾的是，在

³⁸ 关于赔偿委员会的制度特征，例如，见 F.E. McGovern, “争端制度设计：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哈佛谈判法律评论》，第 14 期(2009 年)，第 171-193 页。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各国承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法治，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诉诸司法的机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16.3)。

49. 必须将在单方面制裁的不利影响上的补救范式扩大至防止影响的发生。因此，应当按照国际法，要求制裁国尽早真诚地采取坚决措施，终止正在实施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放弃使用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根据《宪章》第六章，国家承诺废除单方面制裁和优先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分歧，符合它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因而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的义务。

50. 一些国家越来越多地诉诸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引起了一些涉及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重申这些原则。假定在完全终止和消除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之前有一个过渡时期，则促请各国在过渡时期按照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要求，遵守公认的行为准则，减轻单方面制裁对人权的不利影响。在本报告附件附录二所载关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与法治宣言草案的要素中，详细列出了这些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除其他外，倡导的行为准则尤其包括下列义务：对强制性措施进行透明的人权评估，定期监测实施措施的效果，确保实施有效的豁免以满足基本人权和基本人道主义需求，以及保障受害人为获得补救和补偿可以使用正当程序和得到司法审查。

51.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另一建议是，建立一个关于可能对人权产生影响的单方面制裁的联合国登记册，这是一种简单的、实用的、可行的及公正的手段，可以确保在过渡期实施的制裁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将对安理会、民间社会组织及商业部门都有助益。特别报告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商定、建立并开始运营这样的机制。

52. 特别报告员必须强调指出一个相互矛盾的事实：实施具有域外管辖性质和影响的单方面制裁的某些国家，恰恰就是通常反对承认公约、特别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国家义务的域外性质的国家。他同意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观点，作为一个法律和逻辑问题，对第三国实施制裁，制裁国必须对被制裁国国内状况至少承担部分责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制裁国负有对受影响的人口的人权、特别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根本权利进行域外保护的法律责任。因此，特别报告员呼吁，以关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和法治宣言的形式，庄严地重申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涉及国内措施域外实施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是违法的。他相信，这种对域外管辖措施是非法的谴责，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识，不论它们实行什么法律制度。

53. 特别报告员还呼吁明确确认关于制裁国在对第三国实行制裁的情况下承担的人权义务具有域外性质的基本原则；因实施对受影响人口享有的人权造成不利影响的措施，这种行动引起制裁国的法律责任。

54. 最后，特别报告员谨重申，在国内和国际机制中，仍存在对单方面制裁进行司法审查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为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受害者在联合国之下设立特设赔偿委员会，是确保实行问责和提供补救和补偿的可行选择。

Annex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expert working group convened in Geneva on 3 June 2017

1. An expert consultation was held at the OHCHR, Palais Wilson in Geneva on 3 June 2017 to review and evaluate the initiatives put forward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in his reports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Assembly, i.e. a 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likely to have a human rights impact and a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nd the rule of law.

2. In addition to the Special Rapporteur, Mr. Idriss Jazairy, the following experts were in attendance: Professor Mark Bossuyt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Member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and a former judge at the Belgian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fessor Alena Douh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law,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Minsk, Belarus), Mr. Hans-Jakob Schindler (Coordinator of the ISIL(Da'esh)/Al-Qaida/Taliban Monitoring Team), Ms. Catherine Marchi-Uhel (Ombudsperson, Security Council ISIL (Da'esh) and Al-Qaida Sanctions Committee), Professor Aslan Abashidze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Professor 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Department,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Legal Research at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 of Russia), Professor Matthew Happold (Professo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and a barrister at 3 Hare Court, London), Professor Antonios Tzanakopoulo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Mr. Pierre-Emmanuel Dupont (Director,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dvisory Group) who moderated the workshop. Mr. Alfred de Zayas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promotion of a democratic and equi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could not attend but submitted a statement.

3.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expert consultation was devoted to the draft Declaration on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nd the rule of law. One participant first addressed the issue of the legal force of resolution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stressing that for a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to have legal effects, it should have a normative character, it should receive the support or at least the absence of opposition from a large number of States, including the States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the matter concerned,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resolution should be followed by a uniform and constant state practic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behaviour prescribed in the resolution. Another participant addressed the issue of mechanisms of and remedie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gainst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have an impact a broad rang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ir 'contributory nature' in ongoing human rights situations brought before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as underlined by one participant. Possible responses to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were identified, and a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immediate and long-term responses. Responses to measures targeting States (including Special Procedure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United Nations fact-finding missions,¹ a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etc.) and responses to measures directed against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judicial review before domestic courts of the sanctioning state, which is unfortunately subject to a range of legal and practical limitations, if available at all, in many scenarios). It was also called for a reform of the 'targeted sanctions' processes to ensure due process guarantees, that would include the mandatory and immediate opening of crimin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ss in parallel to inclusion in a sanctions list, and lifting of the sanctions (and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a person is recognized not-guilty. A participant referred to the under-utilized inter-State

¹ See Declaration on Fact-finding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Field of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RES/46/59).

complaints procedure, which should be engaged and in some cases could facilitate negotiation and friendly settlement under treaty bodies (e.g. Art. 41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t was suggested that sanctions should also be tes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nother participant examined the relevance of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on Reparation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 stressing that all victim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re entitled to access to mechanism for reparations. Several participant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ight of access to a court, as called for by Article 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other instruments.

4. The second session focu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likely to have a human rights impact. The possibl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and practical modalities of functioning of such mechanism were extensively discussed, and participants generally agreed that such Register could possibl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enefit from wide accept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leva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 as a possible precedent was examined, as well as possible guidance to be drawn from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Sanctions Committee and the Ombudspers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SIL/Al Qaeda sanctions regime, an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relation to sanctions. Participants generally shared the view that unilateral sanctions were primarily to be reported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alleged impact on human rights of the measures) by targeted States, although reporting by targeting State was also possible. The depository of the Register would then notify the targeting state of the allegation by the targeted state of the alleged impact on human rights of the measures, and invite the targeting state to respond to the allegation and to include in the response, information on whether it has conducted an assessment of the possible inadvertent (or unintended) impact on human rights of the measures, and if so provide the result of such assessment, and whether it has taken any steps to mitigate such impact. It was also suggested that a focal point should be created by States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 as regards possible notification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for inclusion in the Register. Also, the inclusion of a potenti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ssociated with the Registry was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that such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be entitled to rule on reparation claims for advers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human rights.

Appendix I

Elements on the 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likely to have a human rights impact

1.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next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elements:

Preamble

2. Welcoming the proposal made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submitted pursuant to [---], and recalling the report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 to establish a consolidated central register at the leve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to recapitulate the list of all unilateral sanctions in force, and sharing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view that the first obstacle to a global evaluation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on human rights is the unavailability of global and standardized updated data, and that full transparency in this regard would be helpful both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private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o the civil society at large,

Operative paragraphs

- [---].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 universal and non-discriminatory Register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to include information on unilateral sanctions, to be reported by targeted States, or by States implementing sanctions as the case may be,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including applicable standards initially comprising those set out in the annex to the present resolution and subsequently incorporating any adjustments to the standards decided upon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its [---] session in the light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anel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below;
- [---]. Also requests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panel of independent experts to be nominated by him on the basis of equitable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and upon proposals by States, to elaborate the technical procedures and applicable standards for comparability of data, to make any adjustments to the annex to the present resolution necessary fo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Register, and to prepare a report on the modalities for ensuring the universality and non-discriminatory character of the Register, to raise awareness concerning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Register and its procedures, and to submit this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t its [---] session;
- [---]. Calls upon all Member States to provide annually for the Register dat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s established by paragraph 26 above, and the annex to the present resolution;
- [---]. Decides,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e universality and non-discriminatory character of the Register, to keep the operation of the Register under review, and, to this end:
 - (a) Invites Member States to provide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 their views, not later than [insert date 2 years ahead], on:
 - (i) The operation of the Register during its first two years;
 - (ii) Any identified obstacles to achieving the universality and non-discriminatory character of the Register;
 - (iii) Possible improvements or expansion of scope to include a monitoring function;

Register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1. The Register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likely to have a human rights impact (the “Register”) shall be established, with effect from [1 January 2018], and maintained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2. Member States are requested to provide data for the Register,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an annual basis by [30 April] each year in respect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m or targeting them and in force during the previous calendar year;
3. The first such registration shall take place by [30 April 2018] in respect of the calendar year [2017];
4. The data so provided shall be recorded in respect of each Member State.
5. Member States are requested to designate focal points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o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 as regards unilateral sanctions;
6. Upon notification of the unilateral sanction by the targeted State or States,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seek the views of the source State or group of States and vice versa.
7. Unilateral sanctions covered are those taken by virtue of law or executive decision or under any other form by the source State or group of States.
8. The Register shall be open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9. In addition,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provide annually a consolidated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data registered.

Appendix II

Elements for a draft General Assembly declaration on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nd the rule of law

A. Basic principles

1. Full account should be taken of the position expressed in resolution 34/13 adopted by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24 March 2017, which ‘urged all States to refrain from imposing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lso urged the removal of such measures, as they are contrary to the Charter and norms and principles governing peaceful relations among States at all levels, and recalled that such measures prevent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nations while also affecting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
2.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have a tendency to remain in force irrespective of the achievement of its purported objective;
3.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involving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measures are unlawful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4.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in a number of cases entail severe adverse impacts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f targeted populations and individuals, have often proven to be inefficient, and are most likely to entail unintended effects in the form of adverse human rights impacts on non-designated third parties;
5. Whilst targeted Stat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human rights impact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imposed by source countries, the latter are also accountable for any adverse effects on human rights occurring in target countries, even if such effects are unintended, to the extent that “when an external party takes upon itself even part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ituation within a country (whether under Chapter VII of the Charter or otherwise), it also unavoidably assumes a responsibility to do all within its powers to protect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f the affected populatio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respect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1997/8, para. 13);
6. The inhabitants of a given country do not forfeit basic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by virtue of any determination that their leaders have violated nor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s affirmed by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respect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See E/C.12/1997/8, para. 16).
7. In situations where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inflict undue sufferings/have an egregious human rights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of a targeted State, whatever legal motive is invoked, they become clearly illegal and their source countries should be called to account.
8. Such call for the removal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pplies to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s well as to targeted measures and to economic as well as to financial measures;
9. As a consequence, the basic principle should be that States and groups of States should commit themselves to refraining from imposing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s well as remove such measures as are in force, and shall commit to using other means of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nd differences;
10. The present Declaration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arising from the legal regime of countermeasures in the sens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 Wrongful Acts;

B. Mitigation: Universally/Generally accepted rules of behaviour

11. Pending the total removal and termination of all existing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nd renunciation to their use, al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on human rights;

12.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preceding the total removal and termination of all existing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and renunciation to their use should be shorten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13.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following universally accepted rules of behaviour shall be asserted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impacts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a) The parties implementing unilateral sanctions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conduct a transparent 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measures envisaged, and to monitor on a regular basis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asures, including as regards their adverse effects on human rights;

(b) The parties implementing unilateral sanctions are under an obligation to ensure effective exemptions for satisfying basic human rights and essential humanitarian needs;

(c) There must be an end to the politicization of what was intended to be a purely technical interbank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 mechanism, whose manipulation in the form of selective exclusion is tantamount to re-introducing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on targeted countries;

(d) Mechanisms to guarantee due proces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judicial review for obtaining remedies and redress for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should be available to:

- Impacted groups, though non-targeted (by comprehensive or sectoral sanctions), and
- Individuals and legal persons and entities targeted (by targeted sanctions).

(e)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the requirement of due process in relation to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pending their total elimination, shall be the following:

(i)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for judicial review of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 The factual and legal grounds for the measures have to be disclosed to the concerned parties;
- The availability of, and the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for, a right to appeal/judicial review,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the targeted parties upon notification to the concerned parties;
- Such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should allow for a review of the substantive factual and legal grounds for the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s well as in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ocedural standards;
- Such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should be in place and available at the same level (either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either regional organization or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source of the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concerned; in case of unavailability of procedures for remedies at the domestic level or at the level of a group of countries imposing sanctions, the targeted countries or persons should be entitled to seek remedies by the Committee of the treaty body concerned, i.e. CESCR;
- Such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should be of a judicial nature or at least, for a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nature of an Ombudsperson or other quasi-judicial mechanism;

(ii) Notification of the measures to the parties concern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without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s;

(iii) Time-bound limitation of the measures, and biannual monitoring and review;

- (iv) Reversibility of the measures;
 - (v) Appropriate humanitarian exceptions;
 - (vi) A regular mechanism to monitor potential adverse impact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se measures; and
 - (vi) Availability of effective compensation/reparations (including financial) when unwarranted adverse impacts on human rights have occurred.
-